

往事如昨

母子相会在淮海战场

单兴均/口述 单强/整理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苏北解放区不久就被敌侵占。单庄村的共产党员、干部家属200多人被迫背井离乡,向东撤退。我母亲、叔父带着兄弟4人,全家6口一起东撤。

东撤之路异常凶险,国民党部队装备精良、人数众多,加上地方还乡团疯狂反扑,革命队伍伤亡惨重,不少基层党组织与政权遭到破坏。许多干部、战士与革命家属被迫“有亲投亲、无亲投友”,隐藏分散,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经过近半年的东撤,我们先后到了宿迁、淮安、盐城一带,然后北上。1947年2月,东撤的干部和家属队伍穿过陇海铁路,辗转到了鲁南。

此时,国民党部队开始集中兵力重点进攻山东,妄图在临沂一带和陈毅首长率领的部队决战,甚至叫嚣着要捉拿陈毅,局势万分紧张。上级决定部分干部与家属集体参军,我和叔叔单作典、大哥单兴辰、堂弟单兴章四人正式参军,加入华东野战军。

组织挑选了一批身强力壮者深入敌占区开展武装游击,堂叔单作荣就被派到安徽灵璧县,还有一批干部与家属如单兴甲、单兴振等人从山东渡海前往东北解放区。少数老幼则滞留敌占区,艰难度日。母亲孙桂英带着9岁的弟弟单兴惠开始在鲁南、苏北、淮北等地流亡。此时,我家中5个男丁有4个参加革命,只剩下9岁的弟弟单兴惠和40岁的母亲相依为命。

战场的形势瞬息万变,我们要跟随部队不断转移,裹着小脚的母亲和年幼的弟弟却是有家难回。那时,国民党还乡团凶狠残暴,回老家就是死路一条。他们娘俩只能一路从鲁南往苏北逃难,最终流落到安徽灵璧县一带。

有一天,娘俩在村里讨饭,母亲从村东头往西要,弟弟从村西头往东要。当时我敌后武装就驻扎在这个村子里,中午部队开饭时,炊事员看到路边站着个瘦小的孩子,手里攥着破碗,便上前询问,弟弟说叔叔哥哥们都去当兵了,自己和母亲不能回家,只能讨饭。炊事员看他可怜,给了他一个馒头,又问他家在哪儿,当得知是单庄村人时,赶忙喊来单作荣叔叔。作荣叔刚执勤回来,一眼就认出了我弟弟,惊讶道:“小三,你怎么在这里?”我弟弟就将和母亲流落在此地讨饭的事告诉了作荣叔,作荣叔又心疼又庆幸。当时部队四处游击,不停转移,没法带着娘俩行军,作荣叔便找到村里的保长,郑重叮嘱:“这是我们部队的家属,你务必保证他们的安全,要是出了半点差错,我唯你是问!”保长不敢怠慢,连忙答应,把娘俩安置下来。母亲便在当地帮着干杂活,暂时有了落脚之地。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全

面打响。天寒地冻,还下着大雪,22日黄百韬兵团被歼灭,我们华野卫生部直属医院驻扎到灵璧县一带收治伤员。母亲看到大部队路过,天天都站在路边苦苦等候,紧紧盯着过往的战士,盼望能看见自己的儿子。单作荣叔叔一直惦记着娘俩,得知大部队动向后,赶忙把母亲和弟弟带到了华野卫生部我哥哥单兴辰所在的驻地——张大路。

张大路地处灵璧县北部,位于睢宁至宿县(今宿州)的交通要道上,是连接津浦路与洪泽湖地区的战略枢纽。因历史上地处交通要道,居民沿路建房形成街市,且居民多以张姓为主,故得名“张大路”,后简称为“大路”。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物资转运和人员调动的枢纽。淮海战役期间,灵璧全县承担了繁重的支前任务,包括运输粮草、转运伤员、组织民工等。张大路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前线作战,但张大路所属晏湾村设有野战医院,用于救治前线转来的伤员。

那时,我在距离卫生部五里远的野战医院,在药房负责烧蒸馏水、配制注射液。那天,天还没亮,医院突然接到电话,点名让我和堂弟单兴章赶快去卫生部。我们心里满是疑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一走进卫生部机关教导员驻地,我们当场愣住了——母亲和弟弟正坐在屋里!

日夜思念、离散近两年的亲人,竟然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重逢了。我、母亲、哥哥、弟弟、堂弟母子兄弟五人,紧紧抱在一起,痛哭流涕。这份突如其来的团圆,在残酷的战争中显得很真实,就像做梦一样。所有的委屈、思念、牵挂,都在这一刻化作止不住的泪水。

当天早上,教导员特意陪我们一起吃了早饭,既为我们的团圆感到高兴,也语重心长地叮嘱我们:“一家人相逢是大喜事,但革命战争还在进行,胜利的日子不远了,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一定会消灭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如今南方还在敌人统治之下,我们要打过长江去,将革命进行到底。”短暂相聚后,保长套了辆牛车把我母亲和弟弟送回了老家单庄村,那时老家也解放了。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我们部队挥师南下,向长江北岸集结。4月21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签发命令,“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一声令下,百万雄师过大江,我乘着木船从江阴横渡长江,一路抵达苏州。5月19日,在苏州寒山寺旁的香樟树下,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5月27日上海解放,我随部队进驻上海,跟着部队继续为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近80年过去了,淮海战场上的这次母子相会,让我铭记终生,也更加坚定了我的革命信念。

乡村记忆

屋檐下的蒜辫子

崔启昌

老家西岭旱田里翻涌起黄澄澄的麦浪时,村人们头年暮秋种的大蒜走完了从萌芽到抽苔,再到鳞茎发育成熟的整个过程。这段时日,愈发浓郁的新蒜香溢进院落,透过门扉、窗扇挤进屋内。住村西梢的邻居杨叔闻味而动,猛地搁了茶碗,直了腰板:“童他娘,里间桌子边的斧头递给俺,今年大蒜收成好,得多砍些两三拃长的木橛子楔进屋檐下的墙里,多挂些蒜辫子呢!”

吃蒜不光是邻居杨叔一家老小的口味爱好,更是老家村人辈辈传承的饮食习惯。清贫年月,老家人一日三餐大口啃着窝头、咬着地瓜,或者扒拉几筷子糙菜馅的小豆腐,随即剥粒蒜瓣填进嘴里咀嚼,粗茶淡饭与蒜瓣的辛辣香气相互交融,一时竟能让肤色黝黑的男人跟细语轻声的女人同样体验到食物充饥果腹的惬意与快感。鱼肉丰富的日子里,于席面上素六荤八的盘碗当央置放一两碟鲜蒜或风干过的陈蒜,吃肉就蒜,尝鱼嚼蒜,吃擀面吃米饭吃饺子,更是少不了蒜,对此,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几乎是心照不宣。吃几瓣大蒜,品几番辣香,日子里仿佛洇浸了些许别样滋味,眼前的世间诸事也像是一下子变得不再过度复杂,曾经难解的鸡飞狗跳之事似乎陡然迎来了和暖通透的光亮。

收蒜时节,四间或者六间正房面南的土墙、石墙、砖墙上,都楔上数量不等的木橛子。这些质地硬实的槐木橛子、柞木橛子,甭管啥季节都能顶得住适量重物的拉拽,一根烧火棍粗细的木橛子上挂个五六串、七八串蒜辫子都不碍事。屋墙上夏日挂蒜辫,秋天来了,多余的木橛子上挂红彤彤的辣椒辫子,挂金黄黄的谷穗辫子。大蒜也好,干辣椒、谷穗黍穗高粱穗也罢,还有留做种子的干豆角、干扁豆,立秋后从山梁沟壑间捡拾的野松莪之类,经过村人的手,都规规矩矩成为“辫子”,拴挂在屋檐下的木橛子上,让之前了无趣味的清寂庭院,刹那间灵动了许多。

小时候,我记得爷爷家的屋子低矮,爷爷、奶奶和叔叔们进屋出门得俯一下身子方能避免磕到头。爷爷个头高,翘脚伸臂就能够到屋檐。尽管屋檐低,爷爷和奶奶每年麦黄时节仍会楔牢靠屋檐下闲置的木橛子,同时,用新砍的槐木或柞木橛子替换掉不中用的烂木橛子。自留园里起畦挖到家的新蒜个头大,蒜秸软塌,搁稳板凳,抽完一锅子旱烟,爷爷便娴熟地盘编蒜辫子。受屋墙低矮的限制,爷爷完工的每根蒜辫子上蒜头顶多七八十个。蒜辫子虽短,但挂到屋檐下的木橛子上,窄巴巴的庭

院里像是一下子亮堂了许多。爷爷直直腰身,再缓缓退后几步,好长工夫盯着自个儿亲手盘编的蒜辫子,口中喃喃自语:有了它们,咱一家老少的饭碗里就有了好滋味。

我读小学三年级那年,父母领着我们兄妹几个跟爷爷奶奶分家过日子。当年秋末,父亲在不大的自留园里足足种了两畦大蒜。平摊上半拃厚的拌肥土,父亲又专程去生产队的场院边上挑了两担腐烂大半的麦糠撒在蒜畦里。“给畦里新植的蒜盖上这层被子,苗子出得齐,蒜棵子长得壮,来年麦收时蒜头个儿大。”父亲在公社医院当医生,对大蒜消杀病菌、强人体魄的功能知晓得多。许是基于这个原因,他对于种蒜格外偏好。暮春,青麦正抽穗扬花呢,他便老早着手砍木头、修橛子,离麦子成熟尚有个把星期,我家屋檐下的墙面上早有父亲精心布局楔下的十多个木橛子了。庭院院墙的内面上也有父亲楔下的错落有致的木橛子。母亲、邻居杨叔以及村东崖和村南场来找父亲把脉看病的村人见了,都不解地问道:“楔这么多木橛子,哪有那么多蒜辫子挂呀?”父亲听了,停顿一阵子,说:“多楔些木橛子,拴挂的不一定非得是拌饭调味的大蒜,还有老少对过好日子的期望……”

在外当兵那些年,每回过假期或度周末,我想家的思绪里常会涌出早年爷爷、父亲以及老家村人们在屋檐下拴挂蒜辫子的情景,想起那些年老家村人们不算宽敞的院落里,因为有屋檐下一串串蒜辫子的装点,大伙都对过好日子增添了新的向往。看着屋檐下一串串带有泥土、溢着辣香的蒜辫子,村人们倦意浓重的脸庞上呈现出了暖意融融的笑意。几次回老家探亲,我都尽可能多走动几户人家,看他们昔日的土坯草屋变成了新修或翻建的宽敞瓦房,墙面上照例拴挂着成排成串的蒜辫子,感受到老家村人们对更好生活的倾情渴望。

如今,我和家人已不在老家居住了,城里的房子面积不大,但阳台还算敞亮。每年麦黄前,我都会回老家买些村人种植的新蒜,学着当年长辈们的样子,认真地盘编成蒜辫子,虔诚地拴挂在我专门楔进阳台内墙里的木橛子上,使其与我从老家带来的七八种花草草构成独有的别样图景。一来让产自老家的大蒜为一家人的吃食提鲜增味;二来朝朝暮暮目睹着它,提醒自己和家人这普通的蒜辫子从何处来;再是让自己和家人能时常望见它、想到它,不至于萌生住上楼房,离地高了些,离老家远了些而身不愿着尘、脚不愿粘泥的念想。